

---

# 明清时期南澳港的海上贸易

林仁川

---

南澳港位于闽粤交界的海面上，辽阔的海域是东亚古航线的重要通道，海上交通十分方便，向北航行可到日本、朝鲜各国，向东可抵达菲律宾群岛，向南越过南海，直达爪哇、印尼等南洋各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使南澳港在明清时期迅速崛起，成为我国东南沿海著名的私人海上贸易港口。

## 一、南澳港的兴起与韩江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南澳港处于韩江口外，是粤东、闽西的出海口，韩江，“在城东韩山下、合汀、赣、循梅诸水，汇于三河坝、合产溪、九河、凤水，过凤棲峡经鳄溪为韩江，至凤凰洲分为三支，一从急水塔过鲤鱼井，由饶平石碑脚至澄海新港入海，一从澄海蛋家园又分为二，半归东港入海，半归西港入海，一从泗溪塔经澄海龙潭溪至东陇入海”<sup>①</sup>，韩江汇集广东境内的程江、梅溪、石窟溪和福建的鄞江和头溪、芦溪，成为联系粤东和闽西山的大动脉，如大埔县的石上埠与闽西上杭境内的鄞江相通，嘉靖时，“凡潮、惠仕宦，商贾赴京入闽及江浙，舟止此处转输，络绎不绝”<sup>②</sup>。饶平县的教场浦墟“通江右闽汀”。流经平远县的石窟河“为江西粤都、兴国、会昌、宁都、瑞金、福建武平等埠运道。”<sup>③</sup>韩江的水上交通网为南澳港的发展提供便利的运输条件和广阔的经济腹地。

明清时期，粤东地区经济有较大的发展，沿海人民修筑海堤，“疏筑成田”，扩大耕地面积，沿江两岸也加固河堤，兴修水利，如韩江的“江东、东厢二堤，延袤广远，溃决既久”，严重威胁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雍正四年进行大修，“筑灰墙以杜渗泄，砌石矶以障狂澜”，自冬至春，经过五个月奋战，费工役49100个，终于建起一条“长虹屹然，

绵亘相接”的大堤<sup>[4]</sup>，有效地保护两岸的农业生产。又如澄海西北三都“自横陇抵海岸皆接垵地也，南北有二堤，为三都保障，韩溪水东注夹流堤左右，堤内田数万计，咸取给兹水以灌溉”，明代中期进行扩建，重修新溪涵，增建水闸“以时启闭，遇旱则启之，以济中下之涸，过涝则闭之，以免上外之溢”<sup>[5]</sup>，使数万亩良田成旱涝保收田。与此同时，农业集约化程度也有提高，据乾隆年间潮阳人郑之侨的《农桑易知录》记载，当时耕作更为精细，投入的劳动也更多，如犁耙，每年收获完毕，犁冬晒霜，第二年春天又耙一次，犁一次，去掉杂草，插秧前还要犁耙一次，使田土松软，禾苗生长后，再进行中耕，拔除杂草，同时将“横根档断，使直根生下而气固”。对施肥也很讲究，不仅施用家畜粪肥，还用植物肥，“种绿豆，小豆，油菜等物，俟其开花结实，随犁地掩杀之”<sup>[6]</sup>。除粮食生产增产外，与出口商品有关的经济作物发展也较快，种植面积日益扩大，产量也不断上升，经济作物的种植已在农业经济中越来越占重要的地位，如龙眼，潮州所辖管的“九邑俱处处有之，而揭阳之价尤惠”<sup>[7]</sup>。柑的质量很好，“潮果以柑为第1品”<sup>[8]</sup>。甘蔗种植也较普遍，潮阳、澄海都出产甘蔗，甚至地处山区的大埔县也有“种甘蔗者”。经济作物的发展又促进民间手工业的发达，如揭阳县的制糖业，不仅种类多，有乌糖、砂糖、白糖三种，而且，数量也较大，“今栽种益繁，每年运出之糖包至数十万，遂为出口货物一大宗，潮虽各处有之，揭实独专其利云”。再如饶平的瓷器也很有名，嘉靖以前多为青釉瓷器，嘉靖以后，开始烧青花瓷器，并改用匣钵单件烧，不仅质量好，器形制作也更为精巧。大埔的陶器“坚致雅润，人家常用，并贩运各处”。同时农村纺织业也有一定程度发展，如潮阳“女工最勤，寒暑不辍，故棉布乡间所出极多”<sup>[9]</sup>，葛布“出潮阳者曰凤葛，以丝为纬，亦名黄丝布”<sup>[10]</sup>，苎布、“共黄润春，生苎也”，潮州府所属“九邑乡村，无不织之妇，而揭阳，普宁苎布之细者，价倍纱罗”<sup>[11]</sup>。蕉布乃唐朝时潮阳的贡品，当时，“每年贡蕉布十匹”，到明清时，“潮州府故其俗，至今种蕉、煮以纯灰水漂，辨令乾，及绩为布”<sup>[12]</sup>。此外，潮州的锡器加工业和制锁业也很有名，民间流传“姑苏样、潮阳匠，揭阳之锡居其上”的谚语，制造的锁“尤工妙，故世称潮锁云”<sup>[13]</sup>。粤东经济作物和民间手工业的发展，为商品出口提供更充足的货源。

明清时期闽西的经济也得到长足的发展，特别是经济作物发展较快，汀州府的烟草种植十分普遍，“膏腴田土，种烟者十居三、四”，其中以“杭、永为盛”，如永定县“膏田种烟利倍于谷，十居其四，国朝充饷后，地效其灵、烟产独佳，永民多藉此以致厚实”<sup>[14]</sup>。在农业发展基础上，手工业也较发达，上杭、连城、长汀的竹纸十分有名，连城生产的大连、宣纸、粉连在市场上十分畅销。上杭造纸业也较发达，据民国县志追述“旧时纸不下百余万”<sup>[15]</sup>。汀州府的归化“民皆佣旁县造纸，先生（张学伊）课种竹。求得养竹法十余事，逾年竹成，归化纸遂为闽中冠”<sup>[16]</sup>。由于造纸业的发达又促进了印刷业的发展，如汀州四堡乡是福建三大印书中心，当地居民“皆以书籍为业，家有藏板，岁一印刷，贩运远近，虽未必及建安之盛行，而经生应用典籍以及课艺应用之文，一一皆备，城市有店，乡以肩担，不但便于艺林，抑且家为恒产”<sup>[17]</sup>，据调查，当时著名的大书坊有碧清堂、

文海楼、文香阁、翰宝楼、五经堂、崇文楼、素位堂、萃芸楼、梅中昌、种梅山房、本立堂、以文阁、林兰堂、万竹楼、德文堂等 20 余家。<sup>[18]</sup> 这些大书坊既经营刻书，又兼营书籍的销售，规模比较大，有的已发展成有数十位雇工的手工作坊，如马恰富经营的刻书坊中，每餐要“供给数十刻匠饭餐，米置甑中，力不能举，先将甑放下锅台，以箕递米下，熟，命匠举起”。<sup>[19]</sup>

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韩江流域的商品交易日趋繁荣，各地出现许多墟市，成为商品交易的初级市场，大部分墟市因商品较丰富，是“逐日市”，如海阳县的渡头庵墟，在“县南六十里，即龙溪都庵埠市，海、潮、揭、澄四邑商贸辐凑，海船云集，逐日市”；意溪墟“县东南厢六里，即蔡家围，竹木交易之所，逐日市”；潮阳县的达濠市“县东三十里招收都，鱼盐之利甲于他墟，逐日市”；揭阳县的棉湖市“即棉湖寨，人烟稠密，百货聚积之所，逐日市”；饶平县的南门街市“旧在城内，今迁南门外元歌都，商贸辐凑，诸货毕集，逐日市”；黄冈市“县东南九十里宣化都，其地依山背海，鱼盐之利旁及邻邑，通货贸财，颇为繁盛，逐日市”；大埕所市“县东南一百三十里宣化都，多鱼虾瓜果布匹麻铁，逐日市”；石溪头埠，“县东南十里元歌都，海外鱼盐小舟装运至此，三饶之民以粟易之，逐日市”；大埔县的三河坝市“县南四十里新寨城外，舟楫辐凑，贸易者为浮店，星布洲汊，凡鱼盐布帛菽粟器用诸货悉备，逐日市”<sup>[20]</sup>。与此同时，韩江上流的商品交易也日趋频繁，上杭的蓝靛交易十分活跃，《上杭县志》云，“前清嘉道以后，邑人出外经商，以靛青业为最著”。闽西纸的输出也很多，“汀地货物，惟纸远行四方，各县制造不同，长邑有官边、花笺、麦子，黄独等名，色纸则有黄丹，木红，若市间鬻竹纸，贡纸，则来自归，连两邑，长邑无之，归邑红纸最佳，其金银纸则以锡箔刷沾纸面，或染成黄为冥帛，连邑纸有连史，官边、烟纸、高帘、夹板等名”<sup>[21]</sup>，众多的闽西土纸，沿汀江、韩江运到潮州发售。

随着商品流通的加快，市镇的繁荣，韩江流域出现了商人集团，其中以潮州帮商人最为出名，潮州帮商人包括海阳、澄海、潮阳及大埔等商人。海阳商人“挟资以游者，虽远涉重洋而不为惮，康、雍时服贾极远，止及苏、松、乍浦、汀、赣、广、惠之间，近数十载则海邦编历，而新加坡、暹罗尤多，列肆而居”。<sup>[22]</sup>澄海的糖商资本雄厚，每当“糖盛熟时，持重资往各乡买糖，或先放账糖寮，至期收之，有自行货者，有居以待价者，侯三、四月南风，租舶艚船装所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至秋东北风起，贩棉花色布回邑，下通雷琼等府，一往一来，获息几倍，以此起家者甚多”。<sup>[23]</sup>潮阳县“滨海以鱼盐为业，朝出暮归，可俯仰自给，至于巨商逐海洋之利，往来燕齐吴越号富室者颇多”<sup>[24]</sup>。大埔县商人也很有活力，“人竞经商于吴、于越、于楚、于闽、于豫章，各称资本多寡以争锱铢之利”。<sup>[25]</sup>潮州富商大贾的出现，说明当时的商业资本是很活跃的，一旦他们在国内经营受到阻碍，必然流向海外，成为私人海上贸易的雄厚资金。

南澳港除了有广阔的经济腹地，丰富的物产资源以外，港湾交错，岛屿众多，便于隐蔽、寄泊，是私人海商活动的理想场所，南澳位于饶平县东南二百里的海中，“形如笔

架，高约二百余丈，周围三百余里”，其山“四面蔽风，大潭居中，可以藏舟”，除南澳外，在它的周围还有云澳、青澳、深澳、隆澳。青澳在南澳岛东边，“番舡多湊泊于此”，深澳“内宽外险，蜡屿，赤屿环处其外，一门通舟，中容千艘，番舶寇舟多泊焉”，嘉靖时，明朝官兵“尝用木石慎塞澳口”，不久，海商“使善水者捞起木石，澳口复通”，隆澳“则轴护往来门户也”，南澳附近还有辞郎洲、宰猪澳、后泽澳，“皆宽衍，海寇据于此”。<sup>〔26〕</sup>

南澳不仅港湾复杂，便于隐蔽，还位于闽粤交界处，介于福建诏安县与广东饶平县之间，两县“相距百余里，中隔大海，偶遇风阻，即难飞渡，县令实有鞭长莫及之虞”。<sup>〔27〕</sup>更重要的是因地处边界，两者“分疆而守，分将而营，彼此推诿”，是封建政府统治势力薄弱地区，对私人海商十分有利，“福建捕急则奔广东，广东捕急则奔福建”，<sup>〔28〕</sup>海商可以逃避官兵的围剿，有很大的活动余地。

由于南澳在经济上有粤东、闽西广阔的经济腹地，资源丰富，在港口位置上，港湾复杂，进退方便，在政治上处于两省统治势力的裂缝之中，因此，明清时期发展成为东南沿海的私人海上贸易商港。

## 二、南澳港海上贸易的性质和特点

南澳港的海上贸易与我国历史上传统贸易港相比，有显著的不同特点，如广州、泉州的海上贸易，基本是由市舶司管理的官方海上贸易，而南澳港不是政府指定的贸易港口，而是冲破海禁政策的民间海上贸易港，因此，它一开始便以“走私”的形式出现。

### （一）明代的走私贸易

早在嘉靖年间，南澳便是海商云集的地方，每年“定期于四月终至，五月终去，不论货之尽与不尽也，其交易乃搭棚于地，铺板而陈所置之货，甚为清雅，刀枪之类，悉在舟中”<sup>〔29〕</sup>。可见，南澳港早期的贸易时间较短，每年约一个月左右，交易的场地也较简陋，只有临时搭盖的木棚草篷之类，到嘉靖末年，已有所发展，“倭自福建之浯屿，移泊南澳，建屋而居”，海商已在南澳岛上建立固定的场所和商店，进行经常性的贸易活动，特别是许栋、许朝光、林国显、吴平、曾一本、林道乾、林凤等海商集团占据南澳后，使南澳港的海上贸易发展更快，如许栋，饶平黄冈人，是粤东海商集团的头目，他的养子许朝光“号为澳长，势益炽，踞海阳之辔望村，潮阳之牛田洋，揭阳之鮑浦”，控制了南澳港周围的整个海域，在海上“计舟摧税，商船往来皆给票抽分、名曰买水”，许朝光自己“深居巨舶，高牙大纛，羽卫森严，俨然海外夜郎”。<sup>〔30〕</sup>再如林国显，也是饶平人，绰号小尾老，与沈门、田浪广都是海盗商人李大用的余党，李大用被击败，林国显收拾残部，在闽粤海面上活动。嘉靖四十一年（1563年）收徐碧溪为义儿，由碧溪引导攻占南澳，建

立新贸易据点。又如吴平,福建诏安四都人,“短小有智略,幼与群儿牧、部署号令皆如法,曾为人奴,其主善遇之,主母尝苦平、遂逃去为盗”,〔31〕吴平起事时,不过数十人,“寻入倭中为别哨,遂肆掠劫,及倭灭,而吴平统有其众”。〔32〕吴平海商集团形成后,“设三城海上,纵横南澳、浯屿间”,独立进行海上贸易活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吴平攻占惠州、海丰各县,不久,又转入潮阳,攻陷神山,古埕诸村,不断扩大海商集团规模。第二年复攻梅州、诏安等处,杀把总朱日玘、王豪,“贼焰益炽,势力大振”,此时,吴平已有大小商船二百余艘,众近万人,他以南澳为总部,在岛上“建居室,起敌楼于娘娘宫澳口之前后,泊蒙冲巨舰于澳前深处”〔33〕,在南澳进行大规模的海上贸易活动。这时,不仅沿海人民和商人,冲破海禁的束缚,纷纷到南澳港贩卖货物,而且世界各国的“四方异客”也相继到南澳进行贸易活动,每当汛风季节,往返于南澳的各种商船,相望于道,南澳港的交易,盛况空前,南澳已成为中外海商接触最频繁的港口之一。所以茅元仪在《武备志》中说道:“广福人以四方客货预藏于民家,倭至售之,倭人但有银置货,不似西洋人载货而来换货而去也,故中国欲知倭寇消息,但令人往南澳、饰为商人,与之交易,即廉得其来与不来,与来数之多寡,而一年之内,事情无不知矣”。〔34〕

南澳港走私贸易的发展,引起明朝政府的注意,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戚继光带兵围攻南澳岛,“剿斩万五千人”。隆庆五年(1571年)海商杨志等三十余只大船停泊南澳港,海防同知罗拱辰“统发兵船追杀之”。万历年间,罗拱辰还在深水澳、云盖寺、龙眼沙筑城三座,立墩了望,加强监视。为了加强对南澳的控制,明朝政府还在南澳设漳潮副总兵一员,“漳潮近地兵将戍所悉听指挥,寇至出舟师追逐,寇在闽毋得以走广,在广毋得以走闽”〔35〕使闽广两省的军队统一指挥,共同防守,给南澳岛海商的活动造成很大的困难。

## (二) 清代的鸦片走私和苦力贸易

到十八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华贸易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不仅未能掠夺大量黄金白银,而且还要把白银输入中国,以换取他们日益需要的茶叶及其他土特产品,对于这种情况他们当然是不甘心的,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于是千方百计扩大在中国的鸦片走私贸易,早期的鸦片走私主要集中在广州附近,特别是在伶仃洋面上进行,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鸦片走私开始向粤东及闽浙沿海扩展。为什么鸦片走私从广州向粤东转移呢?这是有二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由于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公班土贸易,并禁止港脚商人进行白皮土的交易,港脚商人不顾公司的禁令而大量走私,东印度公司眼看白皮土的利润越来越高,也积极参与白皮土的投机买卖,1822年,公司买进4000箱白皮土,公开拍卖给孟买的代理商,致使运入广州的白皮土大量增加。由于白皮土增加太快,造成价格下降,公班土的价格也由原来的2500元一箱下跌到1000元,“曾经垄断公班土市场的伊里萨里行面临崩溃,甚至不惜亏本向内地商人叫卖,也无法将

他们的大批存货脱手”<sup>[36]</sup>。与此同时，清朝政府又颁布《失察鸦片烟条例》，要求地方官吏认真禁烟，对夹带鸦片进口失察者，给予严厉处分，这也给广州附近的鸦片走私增添困难，因此鸦片商詹姆士·地臣写给他的加尔各答老板的信中，流露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为了打开广州鸦片走私滞销的局面，詹姆士地臣决心派遣“一支远征队去开辟中国东海岸上的走私贸易”。1823年6月，一艘悬挂西班牙旗帜的两桅鸦片船，沿东海岸北上，到粤东福建沿海进行走私贸易。在它返回之后，地臣报告说：“106天辛苦的结果虽然很少，但是前途的展望，却可鼓励我们再作一次冒险”，随后的几次尝试却很成功，在伶仃洋面上的许多鸦片船开始纷纷沿海岸线北上，到闽粤交界的南粤进行走私贸易活动，福建“诏安县与广东饶平县之柘林、黄冈及澄海县之汕头接壤，此三处，系水陆热闹码头，亦即鸦片囤聚之所，诏安奸民或用本地小船，或在各项货担，带土而回”<sup>[37]</sup>，南澳洋面继伶仃洋之后已成为鸦片走私又一个据点。

公元1834年，东海岸鸦片走私贸易再次出现高潮，这一次与1823年一样，也是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白皮土实行新政策引起的，1831年东印度公司完全取消对白皮土的限制政策，使鸦片生产大为增加，“中国市场上充斥了两种廉价的鸦片，价格暴跌，几达半数”，因此，鸦片贩子迫切感到“必须寻找新市场，必须筹划新的分配方法”。1832年，威廉·查顿“派了两艘满载鸦片和一些匹头货的双桅帆船，溯东海岸上驶”<sup>[38]</sup>，走私鸦片。与此同时，美国鸦片贩子也不甘落后，他们也积极从事东海岸的鸦片走私活动。据当时曾参加这一活动的美国洋行伙记威廉·亨德的记载，美国“的鸦片贸易的又一支的地方，是在东海岸，有几只属于广州两个洋行的中型船只停泊在靠近厦门的泉州、金门、甲子门及南澳岛”。<sup>[39]</sup>自此以后，各国的鸦片走私船到南澳及铜山，厦门的次数逐年增加。道光二十年（1840年）黄爵滋访察报告说：“迨近年以来，或十数次数二三十次，以及数十次不等。其游奕寄泊地方，始则南澳、铜山、厦门、台湾等处洋面，继则闽安、海坛、福宁、烽火等处洋面……均经各该营舟师随时禀报驱逐，而该夷船此逐彼窜，去而复来”<sup>[40]</sup>。

鸦片船在南澳的走私形式，一般是中国私商在广州伶仃洋看样订货并付款，然后到南澳提货的，对此，《广州番鬼录》有一段关于美国鸦片走私船玫瑰号（ROSE）装载了百箱鸦片到南澳交货的真实记载，1837年，公司要威廉·亨德到南澳岛走一趟，将一批在广州卖妥的鸦片运到南澳交货，并另带若干箱鸦片烟去试卖，威廉·亨德邀请一位英国商人同行，他们从澳门急水门出发经过三天的航行，到达南澳岛泊锚，附近已停靠着两条英国双桅帆船，奥米卡号和芬德来总督号。不久，南澳水师统带登船检查，询问为什么在南澳下锚？船上的钱商回答说：“这条船是从新加坡航行广州途中，因遇逆风，漂到南澳，需要在此地补充供应”。水师统带接着宣读不准在此停船进行贸易的谕旨，在进行形式上的检查以后，开始进行私下的交易，这位水师统带直接了当地问：“你们在船上有多少箱，都是卖给南澳的吗，你们还沿海岸向北航行吗”，同时，暗示北边的官吏更加严厉。威廉·亨德回答说船上有二百多箱，我们并不开往南澳以北地区。然后，拿出钱来，“按照前例办理”。水师统带接受贿赂后，立即登船离开，“中国的买货者看到我们的

船已经官方查看过了。便自由的来到船面，一二天后，有些商人的划子从大陆上来到这里泊锚，当他们靠近的时候，我们由他们的桅顶上分辨出他们的暗号，在离开急水门以前已给我们样本，我们升起我们的旗，这些划子靠近我们下锚，在惊人的短时间内，从玫瑰号上接受鸦片，搬到他们自己的船上，这批鸦片是在广州卖出，在那里付款，在这里泊锚交货”。<sup>[41]</sup>

除了鸦片走私贸易以外，西方殖民者还在南澳进行苦力贸易。汕头是一个未开放的港口，“在这类港口英国船只受到的监督要比他们目前在厦门所受到的还要少，这从厦门出了乱子之后，南澳和金星门两处地方很快就发展成为移民出洋的主要地点”，<sup>[42]</sup>所以1853年英属西印度的驻华招工专员怀特写给厦门德记洋行的信中说：“抵达厦门港口的船只，如有适于运载移民的，请立刻代我租下为感，需要船只运送中国移民前往英属圭亚那和牙买加，这两处地方约各有移民五六百人前往”，他接着写道“我意欲使租到的船从南澳接装出洋移民，请你们于租到船之后立刻通知我，我将去南澳与你们会面”<sup>[43]</sup>。虽然怀特的做法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南澳的苦力贸易并没有停止，1854年殖民土地与移民委员会致梅利维尔函指出“对于英国官方人员派船前往南澳一举的谴责，并不意味着英国的招工人员从香港，把通过与他立有合同的苦力贩子从南澳和其他未开放地点招的苦力装船发送出洋”，所以，从南澳上船的华工还是被源源不断运往国外，据美国驻厦门领事布拉德莱的报告，从1852年至1854年南澳的华工输出情况如下表：<sup>[44]</sup>

时 间	船 籍	出 发 港	到 达 港	人 数
1852年11月	英	南 澳	哈瓦那	355
1852年11月	英	南 澳	悉 尼	260
1852年12月	英	南 澳	哈瓦那	347
1852年12月	英	南 澳	英属西印度	445
1853年1月	西班牙	南 澳	哈瓦那	350
1853年2月	西班牙	南 澳	哈瓦那	383
1853年2月	西班牙	南 澳	哈瓦那	390
1853年3月	英	南 澳	哈瓦那	450
1853年3月	英	南 澳	秘 鲁	500
1853年3月	英	南 澳	英属西印度	320
1854年2月	英	南 澳	秘 鲁	250

1854 年 3 月	秘鲁	南 澳	秘 鲁	600
------------	----	-----	-----	-----

根据上表计算, 1852 年从南澳输出华工 1407 名, 1853 年输出 2393 名, 1854 年输出 850 名, 三年共输出 4650 名。其中去古巴 2275 名, 去悉尼 260 名, 去秘鲁 1350 名, 去英属西印度 765 名。到 1855 年南澳的华工输出进展更快。美国苦力船特希文号装载 200 名华工去火奴鲁鲁, 西班牙船贝抢·加抢加号装载 400 名华工去哈瓦那, 英国船罗克斯堡·卡索尔号装运 600 名华工去哈瓦那。按美国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彼得·伯驾的估计, 1855 年从南澳运出的华工及船是:<sup>[45]</sup>

国 家	船只数	吨 位	载运苦力数
美 国	5	6592	3054
英 国	3	3821	1938
智 利	1	500	250
秘 鲁	3	1860	1150
总 计	12	12773	6388

从上表可以看出, 1855 年有 12 只苦力船从南澳输出华工 6388 名, 比 1852 至 1854 年的总数还要多 1738 人, 到 1857 年又有 12 只外国船到南澳, 从事苦力走私贸易, 与 1855 年相比, 两年间到南澳的苦力船几乎增加三倍, 据估计, 从 1852 至 1858 年的短短 6 年中, 从南澳私自掠运出洋的华工达 4 万多名。

从上可见, 明清时期南澳港的性质是一个走私贸易港口, 明朝中后期虽有国际海盗商人在此活动, 但主体是国内的私人海上贸易集团, 到清代由于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大量东来, 南澳港云集大批的鸦片船和苦力船, 从而成为一个国际的走私贸易港口。

[1] 乾隆《潮州府志》卷 16。

[2] 嘉靖《大埔县志》卷 3。

[3] 黄钊:《石室一征》卷 2。

[4] [5] 乾隆《潮州府志》卷 41。

[6] 郑之侨:《农桑易知录》卷 1。

[7] [11] [12] [13] 乾隆《潮州府志》卷 39。



- [8] 乾隆《澄海县志》卷 4。  
[9] 嘉庆《潮阳县志》卷 11。  
[10]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 15。  
[14] 道光《永定县志》卷 16。  
[15] 民国《上杭县志》卷 10。  
[16] 《冈尔昌碑传集补》卷 2。  
[17] [21] 杨湖：《长汀汇考》卷 4。  
[18] 邹日升：《中国四大雕版印刷业基地之一——四堡》（《连城文史资料》第 4 期）  
[19] 《长汀四堡里马氏族谱》。  
[20] 乾隆《潮州府志》卷 14。  
[22] 光绪《海阳县志》卷 7。  
[23] 嘉庆《澄海县志》卷 6。  
[24] 光绪《潮阳县志》卷 11。  
[25] 民国《大埔县志》卷 13 “引旧考”。  
[26]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 10。  
[27] [30] [31] 乾隆《潮州府志》卷 40、卷 38。  
[28] [29] [34] 茅元仪：《武备志》卷 213。  
[32] 林大春：《井丹先生集》卷 15。  
[33] 姜宝：《姜凤阿集》（《明经世文编》卷 383）。  
[35] 何乔远：《闽书》卷 40。  
[36] [38] 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 5 章鸦片。  
[37] 沈汝瀚：《东务学治录》21 页。  
[39] [41] 威廉·亨德《广州番鬼录》（《鸦片战争》1 册 256 页）。  
[40] 《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卷 13。  
[42] 《殖民土地与移民委员会致梅利维尔函》（《华工出国史料汇编》2 辑 36 页）。  
[43] 《怀特致德记洋行函》（《华工出国史料汇编》2 辑 51 页）。  
[44] 《美国外交文件及公档汇编》第 17 卷 57 号文件（《华工出国史料汇编》3 辑 97 页）。  
[45] 《美国外交文件及公档汇编》第 17 卷 9 号文件（《华工出国史料汇编》3 辑 16 页）。

作者林仁川：1941 年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教授